

这一周

聚焦

浙江今年要消灭“大班额”现象

今年,“大班额”现象不仅被写进政府工作报告中,也被搬上全国两会的会议桌。如何让这一现象彻底消肿、完美“瘦身”,不妨来听听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怎么“支招”。

全国政协委员、浙江省教育厅副厅长韩平认为,东部发达地区,“大班额”现象有多种因素的叠加,一是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和新户籍制度的改革,农民进城数量增加,二是外省流入人口增加,三是“二胎”政策放开也会给义务教育增压。“学校原来是按照户籍人口来进行布局的,并没考虑流动人口等的增加,所以原来的资源不能满足现在的需要。”韩平说。

“浙江省的‘大班额’已减少到100多个,今年要把它消灭掉。”至于如何彻底消灭“大班额”,韩平表示一方面要扩大教育资源,如将学校的建设与城中村的改造结合起来,重新规划学校布局;另一方面则要促进城乡一体化,“这需要很多政策一起推进,其中一个较有效的政策是优质高中拿出50%~60%的招生名额分到乡镇初中”。

作者:孙庆玲

《中国青年报》2018年3月26日第1版

绍兴规模最大招才行动启动

绍兴2018招才引智“春季专列”日前来到北京,带来7300余个高薪优岗,其中5300余个岗位面向高校毕业生。绍兴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黄奇凡在现场介绍,这是近年来绍兴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外出引才活动,涉及绍兴市350余家用人单位,绍兴很多用人单位甚至不惜开出百万年薪。

其中,面向应届大学毕业生的5300余个高薪优岗,主要涉及制造业、医疗医药业、高端装备业、教育业、新材料、新能源等行业。40%以上的岗位年薪在10万到50万元之间。其中有650余个岗位来自绍兴的46家事业单位,大部分是绍兴高校推出的教师岗位。

据负责人介绍,绍兴还在机制体制上进行创新突破,在人才子女入学、职称评审、编制保障等方面提供“最多跑一次”服务。人才新政出台以来,绍兴已兑现人才政策资金近6亿元,仅去年绍兴人才专项投入就超过10亿元。

绍兴拥有71家上市公司、4000多家规模以上企业,经济总量超过5000亿元,居我省和长三角地区前列。

作者:惠滢

《中国青年报》2018年3月26日第5版

衢州教育借大数据“变道超车”

“教育大数据应用为高三学生助力很多,2017年高考中,我校学生英语成绩A等率比2016年提高了9个百分点。如今这项技术已经运用到高中各年级大部分学科中。”近日,记者在衢州第一中学采访时,该校信息中心主任聂晓云对记者说。

近年来,衢州从市级层面对教育大数据应用进行统筹。2017年,衢州建成市县两级教育大数据中心,全年投入教育装备经费2.72亿元,比上一年度增长超过100%,60%以上学校主要教学场所实现无线网络全覆盖,配备移动学习终端5000多台。

“现在,我们既抓示范校,又抓扩面提升。”衢州市教育局局长徐朝金说,“我们鼓励学校和教师勇于尝试、敢于冒尖,同时也要求促进教师间、学校间、区域间的融合共享,优质的资源、好的经验都要拿出来分享,鼓励按照学段、学科、使用的工具,成立一些校际联盟,教研部门和技术部门要加强融合、形成合力。以大数据为核心的新技术,已经成为帮助我们实现‘变道超车’的新手段,成为衢州教育发展的新动力。”

作者:王强 湛涛

《中国教育报》2018年3月28日第1版

上海市新中考改革方案发布

3月22日,上海市颁布新中考改革方案:上海市实验性示范性高中50%~65%的招生计划将采用名额分配的方式下达到有关区和初中学校,以促进初中学校均衡发展。到2022年,初步建成具有上海特点、体现科学教育质量观,以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为依据,结合初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初中毕业和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录取制度。

根据上海市委新发布的《上海市进一步推进高中阶段学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实施意见》,此次新中考改革最大亮点是“一依据、一结合”,即依据初中学业水平考试,结合初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上海将优化招生录取办法,整合普通高中现有5种(自荐生、推荐生、零志愿、名额分配、1至15志愿)招生录取方式,调整为自主招生、名额分配综合评价录取和统一招生录取3类。

作者:姜泓冰

《人民日报》2018年3月23日第12版

前不久,一篇名为《请不要给我的孩子减负》的文章火爆朋友圈。作者在文中感慨:“温室里长不出参天大树,学校减负,增加的是家庭和企业的负担。请不要给我的孩子减负!”

“学生减负,家长增负”“减负减负,越减越负”的声音比比皆是,幼小升小、小升初、初升高直至高考的几个关卡牢牢攥住了家长的心。当教育主管部门忙着给中小学生减负时,部分家长却不领情。北京海淀区某小学二年级学生家长瞿女士直言不讳:“家长对减负感到不安,比较难的科目在某个阶段拉下了,孩子以后很难跟得上,还容易厌学。”

60余年来,减负令内容根据时代特征和教育观念的变化进行调整

为什么会这样?其实,自1955年7月教育部发出新中国第一个“减负令”——《关于减轻小学生过重负担的指示》以来,60余年间我国中央及地方相关部门出台的学生“减负令”多达上百道,围绕学习时间、考核方式、教材内容、课外活动、教师水平、学校领导等方面做出了一系列细致严谨的

从减轻过重课业负担到解决课外负担重

减负不是简单做减法

规定。

分析历次的“减负令”,不难发现政策内容和方针,依据时代特征和教育观念的变化进行了调整。从5年前出台《小学生减负十条规定》,把缩减在校时长、课程设置、竞赛次数以及限制作业量、教辅使用量等当作“药方”,到今年2月发布《关于切实减轻中小学生学习负担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的通知》,针对孩子提前放学无人接送的“三点半难题”、校外培训机构泛滥等伴生问题“开刀”,范围和深度都在拓展和突破。

纷沓而至的减负令考试成绩如何?根据21世纪教育研究院近日发布的《我国中小学生学习压力研究报告》统计,过去3年,我国中小学生学习压力稍有好转,2015年日均花3.03小时写作业,2017年降至2.82小时。然而,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中小学生学习日均写作业时间还是偏长。

减负不只是简单压缩学习时间,而是在有效时间提升学习质量
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在今年两会上的发言厘清了这些疑问。他认为,

“违背教学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规律、超出教学大纲、额外增加的内容,我们把它叫作负担。在正常范围内的,我们把它叫作作业、学业,叫作必须付出的努力。”因此,减负绝不只是在课程、教材、考试等方面修修补补,简单地压缩学习时间,降低学习难度,而是减少那些枯燥的、乏味的、反复的、机械的学习,在有效的时间更充分地提升学习的质量,让学生既付出努力,又学得愉快。

实际上,教育的担子不仅是孩子一人在挑,家长、老师、学校等全社会都在承受负荷过重的阵痛。陈宝生呼吁,减负需要各方面合作、共同努力。要抓住学校教学减负、校外减负、考试评价减负、老师教学减负、家长和社会减负5个方面,“整个社会都要提高教育素养,树立正确的成才观、成功观,不要听信那些似是而非的理念,要按照教育规律办事,按照学生身心发展规律来办事,让他们健康成长”。

压缩在校时间为孩子发展特长提供空间,但城乡存在较大差距
但在农村情况却不尽相同。“不

少孩子到家后能完成作业就不错了,有的还要做家务,想补习或者发展特长很难,但从生活技能或者身体素质上说,可能农村孩子又有相对优势。”云南省昭通市鲁甸县文屏镇中心小学校长甄兰芳表示,学生在校时间压缩后,为孩子多元化能力的培养提供了空间,但这样的空间在城乡存在较大差距。

减负后,确实给孩子发展音体美特长预留了更多时间,可是由于乡村孩子很难上补习班,实际上扩大了城乡教学差距。
甄兰芳发现,总体来说,由于招录培训机制存在短板,乡村老师整体教学水平也有所欠缺,压缩教学时间后,部分学生对基础知识的掌握会受到影响。

“减负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培养人才,而不是降低培养人才的标准。”甄兰芳认为,加大对乡村学校支持力度,才能在课程减负的同时让乡村孩子有机会接受更多培训。

作者:张烁 杨文明 陈圆圆
《人民日报》2018年3月29日第16版

说吧

走好高考改革的“平衡木”

在部署全面取消全国性高考鼓励性加分项目之后,教育部日前又接连发文,对2018年重点高校招收农村和贫困地区学生工作和高校自主招生工作加以规范;通过严格报考条件、严格资格审核、严格招生管理、加大违规查处等举措,确保“专项计划”政策真正惠及农村学生。种种规范,旨在让高考回归起点公平,让招生举措不背离政策初衷,用诚信筑牢高考公平、公正之基。

追溯历史,从高考恢复以来,我国高考改革就一直在公平与效率之间、标准与多元之间寻求最恰当的平衡。通过标准化考试确保流程严谨科学,同时也要考虑到不同学校对选才的不同需求及考生的多元差异;作为选拔性考试要体现区分度,但同时也要尽量验证学习效果、体现能力;不但要通过高考满足高校选才的需要,还必须考虑到高考对于整个基础教育的先导作用。

也可以说,随着高考改革进入“深水区”,原来千军万马要过的“独木桥”,现在更像是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平衡木”。区域之间以及省际高等教育资源仍不均衡,在缩小各省高考录取率之间的差距、促进教育公平的过程中,如何更好地兼顾群体利益与个体利益,成为近些年高考改革最难的命题。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任何一项高考改革的探索性举措,都如同平衡木运动员的动作,必须严谨、细致、公正、科学,方能行稳致远。

作为以学科特长和创新潜质等综合评价为基础进行录取的探索性改革举措,自主选拔旨在打破“唯分数论”的窠臼,改变人才培养千校一面的现状,鼓励更多孩子发展多元特色。针对农村和贫困地区学生的“专项计划”,旨在为更多农村考生提供上大学,尤其是上重点大学的机会,打破贫困的代际传递,促进机会公平。几年实践证明,两项探索都在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而积极的作用。

高考之所以万众瞩目,是因为它仍是当下促进社会阶层有序向上流动的重要途径,是寒门学子改变自身命运的最大希望,是守护教育公平及社会公平的重要底线。特别在全国性高考鼓励性加分项目全面取消,地方性加分项目在额度和项目上都日益规范的今天,以高校自主选拔和针对农村和贫困地区学生的“专项计划”为代表的多元探索能否公平推进,更是备受瞩目。简言之,这将直接关乎教育公平的基石能否筑牢,社会公平正义能否得以捍卫。

之所以常说“改革不止步”,就是因为我们的时代在不断进步,问题也在不断出现。制度的调整,要收到真正的效果或者把握全新的问题,有赖于政府、社会、家庭、考生都不折不扣地执行。公平正义是教育的价值基石,而只有用诚信筑牢改革基础,才能保证高考公平建设在正确的道路上行稳致远。

作者:赵婀娜

《人民日报》2018年3月26日



遍地“小眼镜”?

王锋 绘
《中国教育报》2018年3月28日

办好一批优质乡村校正当时

据媒体报道,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农村父母开始将孩子送往城里读书。为了方便孩子上学,有经济条件的家庭在县城买房,一些家长还专职陪读。举家迁入教育条件更好的地区,成为农村教育的新动向。

其实教育移民不是新现象,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存在。典型的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高考移民”,新世纪以来的留学生低龄化,以及普遍存在的受教育人口向大城市梯度流动等。人们为了能够享受到相对优质的教育,一直在寻找迁徙的途径。只要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无论是国际、地域间,还是城乡间,人们都会想尽办法朝对己有利的地方迁徙。农村教育移民潮受到人们的关注,不仅因为它规模较大的社会人口流动,而且与农民的社会阶层特点有关。

教育移民潮中的家庭,不少此前因婚恋需要已在城里置业。由于子女受教育问题具有明确的标志性意义,时间上的限制性特征促使它在举家搬迁的时机选择上,拥有毋庸置疑的正当性。所以,与其说是农村教育移民潮,不如说是下一代的受教育问题,充当了城镇化那“临门一脚”。

新时代的农村教育不平衡不充分问题,集中体现在乡村学校的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不高。尽管近些年来优先增加乡村教育的资源投入,但是乡村的衰落和萎缩正在失去对学校的支撑。生源流失和减少,乡村小规模学校数量增多,学校布局调整

的压力一直存在,这是“后三农”时代的农村教育问题的新特点。受农地改革和农产品收益下降的影响,农村人口对产业的依存度在降低,宅基地确权以及土地流转政策为农民离开世代居住的村庄放开了羁绊。作为公共服务的农村义务教育,一方面在国家及各级政府的重视下不断改善着乡村学校办学条件,另一方面村民宁愿接受进城后子女教育环境不佳(学位少、大班额)的现实和结果(发展指数低),也不愿意继续在农村上学。这是新时代农村教育的新矛盾之一。

面对新问题,我们可以从党的十九大报告和乡村振兴战略中得到一些指导和启发。集中力量办好一批优质乡村学校,应当是目前农村教育的政策选项。十九大报告提出“推动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高度重视农村义务教育”,而乡村学校是农村教育的重要依托和关键节点。应对“农村教育移民潮”中的教育诉求,除了快速增加城市教育资源、消除大班额外,应使仍然留在乡村的人口可以公平接受有质量的教育。乡村学校数量庞大,所处环境和发展条件各异,全部办好难以实现。我们应该围绕优质乡村学校建设,以乡村振兴战略为指导,优化社会支持系统,提升乡村教育治理水平,实现学校教育现代化与美丽乡村建设、社会文化复兴、社会公共服务配套等相融合的教育生态。

作者:李醒东

《光明日报》2018年3月28日